

产权保护与经济增长

PROPERTY RIGHTS PROTECTION
AND ECONOMIC GROWTH

刘凤芹 陆文玥◎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产权保护与经济增长

PROPERTY RIGHTS PROTECTION
AND ECONOMIC GROWTH

刘凤芹 陆文玥◎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产权保护与经济增长 / 刘凤芹, 陆文玥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7. 7

ISBN 978 - 7 - 5203 - 0686 - 7

I. ①产… II. ①刘…②陆… III. ①知识产权保护—关系—经济增长—研究—中国 IV. ①D923. 404②F12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163807 号

出 版 人 赵剑英
选题策划 刘 艳
责任编辑 刘 艳
责任校对 陈 晨
责任印制 戴 宽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发 行 部 010 - 84083685
门 市 部 010 - 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 刷 北京明恒达印务有限公司
装 订 廊坊市广阳区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7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7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17
插 页 2
字 数 269 千字
定 价 79.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010 - 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前 言

美国作家爱德华·阿比（Edward Abbey）说，“为增长而增长乃是癌细胞的生存之道”。如果将财富的累积比作细胞的增殖，人们似乎要问，什么样的累积有利于经济增长，而怎样的增长才是又快又好的。就像今天的医生致力于通过细胞免疫对抗肿瘤一样，面对经济中存在的疑难杂症，经济学家同样思考着一个问题——什么才是促进经济高速有序增长的“好基因”。

从斯密（Smith）到凯恩斯（Keynes），人类在有限的认知空间中审视和思考着变幻莫测的社会现象。尽管众多的经济学者创造了无数种可能的世界，但对于人类而言，或许现实中的这场悲喜剧才是这“无数可能”中最好的那一个。多年以来，走下神坛，迈上黑板，是人们对经济学者们的“理性预期”。特别是在20世纪70年代末，那剂旨在一味拉动经济增长的总需求“药方”不再见效，经济机体似乎出现了明显的抗药性，一面高烧不退（高通胀），一面却又冷若冰霜（低增长）。西方世界“同此凉热”，曾经一度风光无限的西方经济似乎已穷途末路。人们再一次将救世的使命赋予那些早已不堪重负的经济学家们。然而，世界上并没有免费的午餐，任何试图找到永动机原理的努力不过是一厢情愿罢了。作为一门社会科学，经济学仍需保持足够的清醒和理性。那些“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经济方案不过是权宜之策，只有找到促进经济稳健增长的占优策略，才能成为政治家和经济学者们的治世良方。

20世纪90年代初，世界政治格局风云变幻，经济全球化乍暖还寒。在这一背景下，1991年，瑞典皇家科学院将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新制度经济学派奠基人罗纳德·哈里·科斯（Ronald H. Coase），表彰其在交

易成本和产权理论方面的贡献。两年后，另一位新制度经济学派代表人物道格拉斯·诺思（Douglass C. North），因其将包括产权在内的制度因素成功运用于经济史分析之中而获此殊荣。此后，产权理论一跃成为官学研各界的显学。它与1990年启动的人类基因组计划似乎存在着某种历史的因缘聚合。制度之于经济，如同组织之于机体。当人们把经济看作一个有机体而不再是一台僵直的机器时，产权便被从新古典经济研究范式的“黑箱”假设中取出，成为理解经济问题的枢机。

产权理论认为，经济运行的制度基础——产权结构和由此产生的交易成本是经济研究的关键所在。在所有那些试图打开“黑箱”的尝试中，最大胆的非“科斯定理”莫属。根据该定理，如果现实中的交易成本不为零，那么产权的初始划分势必会影响到资源的配置效率。例如，科斯在对英国灯塔的产权变迁史进行研究后发现，那种将灯塔视为政府提供公共品所必需的观点是值得商榷的。英国政府收购私营灯塔的原因，并非出于私人收费困难的考虑，而在于私人收费过高。在他看来，一个好的产权制度，应当能够使各种经济资源包括人力资源得到有效的利用。由此可见，产权对于经济的意义，并不在于谁占有，而更取决于谁的使用效率更高。这无异于解放了产权，从而有利于对生产力的进一步解放。

在将产权理论成功运用于经济史分析的经济学家中，诺思的贡献首当其冲。他指出，“国家的存在对于经济增长来说是必不可少的”，而“离开了产权便不能提出一种有用的国家分析”。他研究发现，在欧洲历史上，荷兰和英国的经济成功应归因于一组有助于提高组织绩效的产权安排。相比之下，法国和西班牙的衰落，则正是其各自低效的产权制度所致。循此逻辑，作为前二者殖民地的美国之所以成功，而作为后二者殖民地的非洲和南美诸国之所以落后，其原因仍可归咎于彼此迥异的产权制度。同样，这也有助于解释“李约瑟难题”，即工业革命为什么没有出现在中国。

可以说，新制度经济学实质上是对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的一种扬弃，同时也影响了后者并使其将制度因素纳入研究范畴。在众多新制度经济学家中，一些人虽已作古，如科斯、诺思和阿尔钦（Alchian），但他们的名字仍熠熠生辉。其中，阿尔钦是产权经济学的创始人，他

的学生张五常以《佃农理论》和《蜜蜂的神话》闻名于世，他的另一个学生夏普（Sharpe）是1990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此外，德姆塞茨（Demsetz）、威廉姆森（Williamson）、巴泽尔（Barzel）、斯蒂格利茨（Stiglitz）、菲吕博顿（Furubotn）和芮切特（Richter）等，在产权理论、国家理论、契约理论和经济组织等方面著述颇多，影响深远。在本书即将付梓之时，又一位产权学派的巨匠摘得诺奖。2016年，瑞典皇家科学院将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美国经济学家奥利弗·哈特（Oliver Hart），表彰其在不完全契约理论方面做出的杰出贡献。根据哈特的理论，由于契约是不完全的，拥有更多资产的所有者将具有更大的“剩余控制权”，而这一权力又将赋予其更大的谈判筹码，因此只要他愿意，他便可以操盘全局。哈特之言振聋发聩，特别是对于现代经济组织的治理，更是一语中的。问题的关键是，权力赋予谁为佳，多少为宜，“门口的野蛮人”还是“屋内的聪明人”？

本书的写作，正是基于上述前沿理论和研究成果，着眼于当代中国实践。全书共分六章。第一章，对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进行梳理，将制度因素纳入经济分析，提出经济增长之本在于制度这一假设，并对不同产权制度下的经济效率进行对比。第二章，从交易成本的视角分析产权的效率问题，对产权和所有权进行区分，强调产权的使用权作用，并探讨产权的界定和保护。第三章，以经济史为视角，探讨产权制度的变迁及国家和政府在保护产权方面的作用。基于欧洲历史，通过将英国、荷兰的经济成功与法国、西班牙的经济失败进行对比，探讨大国兴衰背后的深层原因。第四章，探讨产权的法律保护问题。首先，提出产权的法理基础，确立产权保护的法律依据；其次，从物权法、合同法和侵权法三个方面论述产权的法律保护问题；最后，通过案例分析，解释私有产权和公共利益问题。第五章，探讨产权和有效率的经济组织之间的关系。从产权和效率二者之间的关系入手，提出产权的清晰界定和有效保护是提高经济绩效的前提这一假定。通过契约和组织一系列案例分析，反映出不同产权关系下经济组织的绩效。对于复杂系统而言，探讨纵向一体化、混合型和模块化组织之间的差别。第六章，结合中国国情，对经济发展过程中存在的一些产权问题进行探讨，包括农地流转、环保、矿产和民营企业等方面。此

外，通过案例分析，寻找我国在产权保护的制度建设过程中存在的一些法律问题，并提出相应的意见和建议。

2015年1月，受国家发改委委托，我们团队承担了国家发改委重大改革研究课题——完善产权保护制度研究。同年4月，我主编的《新制度经济学》一书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近些年来，无论是在政府层面还是在学术界，产权问题都已成为关注的焦点。我和陆文玥老师结合自身多年的教学和科研实践，收集和整理了大量国内外文献资料，并同我们的科研团队成员进行多次研讨、反复推敲，完成了这部著作。全书的写作耗时近两年，而其间讨论大纲和筛选资料的工作就用去了三四个月。

寒来暑往，不觉春至。经过漫长而艰辛的努力，本书最终得以付梓。这期间，要感谢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的黄雁生和刘艳两位编辑，为本书的编辑和校对付出了大量的心血，感谢东北财经大学经济学院为本书出版提供的大力支持，感谢我的学生和朋友们为本书提出诸多宝贵建议。此外，写作的过程是艰辛和漫长的，而绝大多数任务要在家中完成，通宵达旦已是家常便饭，这期间我的家人为我承担了很多事情。因此，还要感谢我的家人对我的理解和支持。

本书是我和陆文玥老师合作完成的。陆老师为此付出了艰辛的努力并承担了非常重要的研究写作工作，在此特别感谢他。和陆老师的合作是愉快的，年轻人的思绪敏捷尖锐，对一些问题的洞悉常常令人惊讶。我们也经常切磋，固然没有面红耳赤，但也经常面壁反省，一些章节甚至是直接删掉或推倒重来。讨论的过程是思想自由翱翔的过程，是一种快乐的精神享受。丘吉尔曾说，“（作家）就是一国之君，自给自立。没有人能没收他的财产；没有人能剥夺他从业的资本；……让我们记住了，作家永远可以发挥最大的努力”。的确，写作此书虽然艰辛，但却没人能阻止我们自由驰骋的思绪，没人能妨碍我们与“巨人”在交锋中神交莫逆。总之，当我们的“财产”我们做主时，我们将唤起“最大的努力”，以飨读者。

刘凤芹

2017.2.27

目 录

第一章 经济增长的源泉	(1)
一 经济增长理论	(1)
(一) 外生经济增长理论	(2)
(二) 内生经济增长理论	(4)
(三) 经济增长中的制度	(7)
二 经济增长的源泉	(13)
(一) 稳定的经济增长	(13)
(二) 高效的经济增长	(17)
(三) 契约与经济增长	(20)
三 不同产权制度的经济效率	(23)
(一) 私有产权的效率	(23)
(二) 公有产权的效率	(25)
(三) 共有产权的效率	(26)
(四) 混合产权的效率	(28)
第二章 产权和产权制度	(29)
一 产权的逻辑	(29)
(一) 交易成本	(29)
(二) 财产四性	(35)
二 产权和所有权	(40)
(一) 产权和所有权的分离	(40)
(二) 私有产权、公有产权和共有产权	(44)
三 产权的界定和保护	(46)

◇ 产权保护与经济增长

- (一) 产权的界定 (46)
- (二) 产权的保护 (48)

第三章 产权制度的历史变迁 (54)

- 一 产权制度的确立和演变 (54)
 - (一) 制度变迁的方式 (54)
 - (二) 产权制度的起源 (63)
 - (三) 产权制度与国家 (72)
- 二 西方历史上的经验和教训 (90)
 - (一) 欧洲早期的封建制 (90)
 - (二) 荷兰和英国的成功 (103)
 - (三) 法国和西班牙的失败 (113)
- 三 案例分析 (121)
 - (一) 李约瑟难题 (121)
 - (二) 传统与创新 (127)

第四章 产权和法律 (133)

- 一 产权的法理基础 (133)
 - (一) 宪法与法律 (133)
 - (二) 自由与财产 (136)
 - (三) 信任与承诺 (140)
- 二 产权的法律基础 (143)
 - (一) 物权法 (144)
 - (二) 合同法 (147)
 - (三) 侵权法 (150)
- 三 案例分析 (153)
 - (一) 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 (153)
 - (二) 美国历史上的征地案 (161)

第五章 有效率的经济组织 (169)

- 一 协调与激励 (169)

(一) 协调与激励的机制	(169)
(二) 协调与激励的成本	(179)
(三) 组织内部价格体系	(181)
二 法律规则和组织形态	(187)
(一) 契约与权力	(187)
(二) 非正式契约关系	(195)
(三) 正式契约关系	(197)
三 复杂组织	(202)
(一) 纵向一体化	(202)
(二) 混合型组织	(205)
(三) 模块化组织	(208)
四 案例分析	(210)
(一) 通用和丰田	(210)
(二) 可变利益实体(VIEs)	(216)
 第六章 我国产权保护中存在的一些问题	(225)
一 产权保护的法律制度及其完善	(227)
(一) 农村土地流转中的产权保护	(228)
(二) 环保和治污过程中的产权保护	(231)
(三) 民营经济中存在的产权保护	(233)
(四) 矿产资源生态的产权保护	(237)
二 一些典型的案例	(239)
(一) 农地纠纷系列案中的产权缺失	(240)
(二) 混合所有制经济中的产权缺失	(248)
(三) “乌木案”中的公、私所有权纠纷	(252)
(四) “武汉晶源案”中的知识产权保护	(256)
(五) 整治路边烧烤和产权执行成本	(260)

第一章 经济增长的源泉

一 经济增长理论

现代意义上的经济增长，最早出现于 17 世纪的英国和荷兰。其时，尽管两国人口持续增加，但实际生活水平不降反升，分别提高了 35%（英国）和 50%（荷兰），这是史无前例的。而同期的法国和西班牙，不仅人口减少，而且人民生活水平停滞甚至倒退。随着人类逐渐从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进入到大机器大工业时代，经济增长已不只是简单冷酷的数字加总，而业已成为一国综合实力和国民福祉的集中体现。

自亚当·斯密（Adam Smith）以来，经济学家对经济增长的原因和性质进行着不懈的探索。可以说，从经济学诞生之初，增长问题便成为经济学的主要研究对象，而古典经济学中基于劳动分工的经济增长理论仍然影响至今。在经济学家们看来，专业化和劳动分工的发展、生产技术的进步及由此产生的市场规模的扩大等都是经济增长的原因，进而形成了资本决定论、技术创新决定论和人力资本决定论等一系列传统的经济增长理论。根据经济学理论，经济增长指以国民生产总值（GNP）或国内生产总值（GDP）表示的“一国（或国民）生产的商品和劳务总量的增加”。同样，人均 GNP 或人均 GDP 也是反映经济水平的重要指标。

古典经济学家为现代经济增长理论提供了很多基本要素。这些思想包括：竞争行为和均衡动态的基本研究方法、收益递减的影响及其同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积累的关系、人均收入和人口增长率之间的相互作用、以劳动分工的深化及产品和生产工艺的推陈出新为形式的

技术进步的效果和激励技术进步的垄断力量的作用，等等。^①然而，古典经济学倾向于发挥经济自身的运行和调解功能，强调工资和价格的灵活可变机制，缺少对专业化的深入分析。只是到了凯恩斯以后，经济学家才日益关注经济增长的短期表现。

费舍尔（Fisher）曾说：“受过经济学教育的许多人都记得凯恩斯的那句名言——‘长期来看，我们都会死去’。1979年，美国经济学家赫伯特·斯坦（Herbert Stein）却深有感触地说道：‘我们醒来发现，我们还在长期中活着，并为我们没有成功地关注它而备受折磨。’”^②

在经济学中，长期存在着两种解释和预测经济增长的理论范式，即传统经济增长理论和新经济增长理论。前者通过外生技术进步解释长期经济增长，因此又被称为“外生经济增长理论”；后者强调通过内生决定的人口增长率和技术进步说明长期经济增长路径，故又被称作“内生经济增长理论”。^③

（一）外生经济增长理论

在巴罗（Barro）看来，现代增长理论的起点是拉姆齐（Ramsey）在1928年发表的经典文章，其对跨期可分效用函数的分析就像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一样，得到了广泛应用。而如今，如果不使用由拉姆齐和费希尔引入经济学中的最优化条件，就很难讨论消费理论、资产定价甚至是经济周期理论。

在拉姆齐之后和20世纪50年代之前的这段时间里，英国经济学家哈罗德（Harrod）和美国经济学家多马（Domar）则试图将经济增长要素融入凯恩斯主义分析，以使凯恩斯的宏观经济理论长期化和动态化。他们几乎在同一时期各自提出了两个极为相似的经济增长模

① [美] 罗伯特·J. 巴罗等：《经济增长（第二版）》，夏俊译，格致出版社2010年版，第13页。

② [德] 齐默尔曼：《经济学前沿问题》，申其辉等译，中国发展出版社2004年版，第248页。

③ [美] 罗伯特·M. 索洛：《经济增长理论：一种解说（第二版）》，朱保华译，格致出版社2015年版，第2页。

型，并被合称为“哈罗德-多马模型”。根据该模型，经济增长 G 可以简单表述为 $G = \frac{s}{C}$ ，其中， C 代表资本-产出比且假定不变，因此储蓄率 s （或资本积累率）是决定经济增长的唯一因素。另外，哈罗德还做出了资本回报率（利息率）为常数的假定，这意味着资本和劳动在经济增长过程中是不可替代的。在这种情况下，经济增长要满足哈罗德提出的恒等式是十分困难的。因此，哈罗德得到了一个“像刀刃一样脆弱”的均衡增长条件，即非常难满足的均衡增长条件。此后，经济学家普遍视经济增长为一种暂时现象，认为资本投资量的不断增长将导致资本边际生产率递减。这一理论的政策含义在于，由于经济增长的路径是不稳定的，因此发展的援助是必要的，即需要通过资本和技术的转移促进经济，这就要求政府对经济实行永久性的干预。

由于哈罗德-多马模型与新古典经济学的主体精神相悖，因此受到了尖锐批评。经济学家开始不满于狭隘地以资本集聚来解释经济增长的观点，开始向资本决定论提出挑战，形成了新古典增长理论。经济学家提出国民生产函数的概念，以反映出资本、劳动、技术类投入与预期产出量之间的关系，即技术创新决定论。根据这一理论，资本投资量的增加并非一定会使经济陷入增长率下降的陷阱，相反，更好的技术会使既有的资本流和劳动流转换成更多的产出。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以索洛-斯旺模型为代表，并由拉姆齐等人进行了发展。

50 年代，索洛（Solow）和斯旺（Swan）构建了一个资本和劳动能够完全相互替代的经济增长模型，即“索洛-斯旺模型”。该模型引入了具有新古典性质的总量生产函数——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并且实现了经济增长的自动收敛和动态均衡。该理论描述了一个完全竞争的经济，劳动供给的增加和储蓄率的上升会推动经济持续增长。据此，经济学家得出一系列推论：资本将从人口增长率低的发达国家向人口增长率高的发展中国家流动，穷国经济增长会比富国更快，储蓄率和人口增长率下降会引起经济负增长。然而，新古典增长理论的假设条件仍过于苛刻，以致其结论脱离现实。例如，完全竞争的假设意味着，厂商没有多余的资源可以用于技术研发，于是在生产过程中

也就不存在技术进步。在处理外生变量方面,该模型认为在经济增长率中去除资本和劳动的贡献率后会有一余值,称为“索洛余值”,即技术进步。通过对 1909—1949 年美国资本和劳动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进行定量核算,索洛发现,资本和劳动投入的增加只能解释经济增长的 12.5%。因此,有人将“索洛余值”讥讽为是“对人类无知的度量”。20 世纪 60 年代初,丹尼森(Dennison)等人在经济增长的实证分析中也把这个余值解释为技术进步的作用,从而巩固了索洛的观点。

在索洛-斯旺模型基础上,拉姆齐将储蓄内生化的,提出了拉姆齐-卡斯-库普曼斯模型。该模型最重要的贡献是将动态最优化方法引入了经济增长模型,运用动态最优化方法分析了家庭和厂商的最优决策问题,使宏观的经济增长理论拥有了坚实的微观基础。然而,令人疑惑的是,经济学家运用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解释现实经济增长现象时发现,对经济增长驱动作用最大的生产要素竟然被设定为一个外生变量,有学者调侃,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能解释很多经济现象,就是不能解释经济增长本身。

(二) 内生经济增长理论

对如何将“索洛余值”内生化的这一问题,经济学家开展了大量的工作,新经济增长理论(内生增长理论)应运而生。从产生规模效应的内生增长模型看,新经济增长理论可分为两类。其中,一类秉承熊彼特(Schumpeter)的“创造性破坏”思想,强调技术进步和创新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以格罗斯曼(Grossman)和赫普曼(Helpman)、阿格汗(Aghion)和哈威特(Howitt)等为代表。另一类则强调知识积累和技术革新对经济增长的重要(甚至于决定性)作用,以宇泽(Uzawa)、阿罗(Arrow)、罗默(Romer)、卢卡斯(Lucas)等人为代表。

1961 年,日本著名学者宇泽弘文(Hirofumi Uzawa)提出两部门经济增长模型,讨论了教育部门投入与最优技术进步的问题。1962 年,阿罗发表《干中学的经济含义》,提出技术进步是学习的结果,学习是对生产和投资过程中形成的经验的总结,经验的积累体现为技

术的进步。这种来自于生产和投资过程中形成的经验对技术进步具有正向作用,被称为“干中学”。阿罗通过将技术进步视为生产和投资行为的副产品而使其内生化的,被称为“准内生技术决定论”。但其理论在竞争性均衡与经济稳定增长之间的兼容性问题和增长路径的发散性等方面存在缺陷。

内生技术决定论开始于20世纪80年代,以1986年罗默在《政治经济学杂志》上发表的论文《收益递增经济增长模型》为标志。其后,卢卡斯、贝克尔(Becker)、杨小凯、博兰德(Boland)等人进行了深入探索。

在现实中,许多发展中国家尽管进行了几十年的努力,却未能实现预期的经济快速增长,甚至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的收入差距明显拉大。这一普遍现象,是与传统经济增长理论背道而驰的。鉴于此,罗默和卢卡斯分别从专门研发活动和人力资本两方面解释了技术进步内生化的,一国的技术创新速度是由人力资本积累、研发实力等内生因素决定的。与发展中国家相比,发达国家在这些方面的投资较多,从而可以加快技术的更新,避免了资本边际报酬的递减。

1988年,卢卡斯提出,不同国家之间技术进步水平的差距,主要不是体现在“有用知识的存量”方面,而主要体现在不同素质的劳动者身上。为此,卢卡斯通过为“人力资本”的形成和积累设立专门的生产函数,建立人力资本与相应要素投入之间的数量关系,将人力资本存量的变动内生化的到经济增长模型之中,从一个新视角解释了技术进步及扩散的特点及其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根据卢卡斯的理论,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人力资本的形成对产出的贡献明显大于一般劳动投入方面,那么技术的扩散同样体现在增加了与该技术相应的人力资本方面。

此外,舒尔茨(Schultz)和贝克尔等人发现,产出的增长率会高于投入资源的增长率,这说明经济学家忽视了资源质量的提高这一因素,因此必须考虑人力资本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即人力资本决定论。

1990年,罗默在《内生技术变化》中指出,技术变化是人们在

市场刺激作用下主动作为的结果，依靠技术进步生产新产品由于受到专利保护可以获得垄断租金，这对技术进步有刺激作用，也为长期经济增长提供了重要推动力。因而通过设立研发技术的专门“生产函数”，在经济增长模型中将技术进步内生化的，可以有力地说明长期经济增长之源，提升主流经济学对经济增长问题的解释力。他认为，发达国家资本充裕，但资本的边际报酬较低，因此较之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会有更高的资本积累，如果采用同样的技术进行生产，则会获得更快的经济增长。

可以认为，罗默的经济增长模型继承了阿罗的“干中学”模型，并在此基础上拓展出外部性和规模收益递增的影响因素；而卢卡斯则是在宇泽的最优技术进步模型基础上对人力资本进行了进一步研究。

新经济增长理论解释了发达国家保持快速经济增长并与发展中国家间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原因。然而，事实上，在 20 世纪最后 30 年里，中国（包括香港地区和台湾地区）、新加坡、韩国等亚洲新兴经济体在经济赶超阶段并未对人力资本、研发等内生因素进行比发达国家更多的投资，其经济却始终保持了高速的发展势头，大大缩小甚至赶上了与发达国家之间的收入差距。这是新古典增长理论所无法解释的。原因在于，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忽略了制度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且其假设条件存在问题。

20 世纪 80 年代，受新自由主义学说和“芝加哥学派”观点的影响，经济学家根据主流经济学理论提出了“华盛顿共识”，旨在帮助拉美和中、东欧国家实现市场经济转型。然而，数据显示，1980—1998 年发展中国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的年均增长率下降为 0，而在 1960—1979 年间这一指标的增长率为 2.5%。经济学家威廉·伊斯特利（William Easterly）将这一时期称为“迷失的年代”。

新经济增长理论的局限在于，通过将技术进步内生化的到经济增长模型之中，解释了经济稳定增长的动力机制问题，但技术进步的市场激励作用、技术溢出的外部性特点等问题，只靠市场价格机制已无法解释，必须从制度的角度加以理解，但这些问题在新经济增长理论中是没有得到深入讨论的。有学者认为，新经济增长理论打开了“余值”这个黑箱，给出了技术进步的一个内生解释，但这个黑箱被打开

的同时,人们发现其中又出现了另一个黑箱,即制度要素。要继续打开“制度”这个黑箱,就必须把新经济增长理论与制度分析结合起来。

(三) 经济增长中的制度

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诸多理论和模型很好地诠释了斯密那只“看不见的手”是如何引导人们的自利行为并促进经济效率的。但正如上文所言,新古典增长理论的局限性也成为阻碍其理论发展的原罪。一方面,如果只将整体经济假设为一个单一的拍卖市场,就可能人为模糊了局部均衡和一般均衡之间的显著差异。如果说价格只是某个“拍卖人”的个体决策,那么对于那些不由该行为人所选择的内生变量来说,价格又是从何而来的呢?另一方面,如果假设行为人可以按现行价格购买和出售任何数量的商品,那么又如何解释因其偏离均衡而产生的超额需求呢?在此情形下,市场不能出清,且部分行为人的交易愿望得不到满足。可见,市场机制设计,是一种策略博弈,需要考虑市场的不完备性和参与的不完全性。^①

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新制度经济学为代表,经济学界开启对经济增长中制度因素的研究热潮。新制度经济学派的代表人物有罗纳德·科斯(Ronald Coase)、道格拉斯·诺思(Douglass North)、阿尔钦(Armen Alchain)、哈罗德·德姆塞茨(Harold Demsetz)、奥利弗·威廉姆森(Oliver Williamson)和张五常等。就研究方式而言,一方面,新制度经济学派承袭了新古典的研究范式,通过引入交易成本和产权的概念,对市场和企业内部科层组织的成本进行对比分析。另一方面,该学派则完全放弃了新古典的研究范式,引入产权、交易成本、认知和意识形态等因素,把制度的选择和历史变迁作为研究对象。

受新制度经济学派影响,新古典经济学家也将制度因素引入数理模型,主要通过一般均衡理论和博弈论两种研究范式,对制度问题进

^① [美] 道格拉斯·盖尔:《一般均衡的策略基础:动态匹配与讨价还价博弈》,韦森总译校,格致出版社2008年版,第3—4页。